

如何理解「戰後」東北亞問題

◎ 孫 歌

2003年到2004年間，關於高句麗的歷史記述問題在韓國社會一度引起了很大的反響。由於中、韓兩國政府達成了共識，高句麗問題在發展成為外交和國際政治關係的衝突事件之前已得到了解決，這是中國和韓國知識份子都希望看到的結果。今天，對於東北亞各個地區的人們來說，維護和平是高於一切的基本原則，因此，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是，如何才能維護和平？我們試圖建立的區域間和平，究竟是甚麼樣的機制？

當高句麗問題擺到我們面前之後，有一些潛在的問題浮出水面。可以說，高句麗問題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契機，幫助我們認識這些問題的複雜性。

首先，我們必須回溯歷史，重新面對這樣一個基本的問題：當前近代的「朝貢關係」解體之後，東北亞的國際關係是以甚麼為契機被重新建構起來的？它具有甚麼樣的特徵？

二十世紀的東北亞，是以頻繁的戰爭為媒介推進自己的「現代化」進程的。現代化在東北亞帶來的後果之一，是民族國家和民族自決權的確立。中國和朝鮮半島曾經擁有共同的敵人——軍國主義日本，並且至今各自保留著日本侵略戰爭帶來的創傷經驗，但是這種被侵略的經驗並未造成中國社會與韓國社會之間的連帶感，近年來中日與韓日關係也並沒有產生複雜的相關性。換言之，僅僅依靠日本侵略東亞鄰國這樣一個單純的視角，並不能有效建立和解釋東北亞區域的現代國際關係，日本的侵略戰爭歷史並不足以單獨構成東北亞區域（當然也包括日本本身在內）內部有機聯繫的媒介。今天，我們是否可以把東北亞視為一個相對獨立的認識對象，這個問題已經引起了很多爭議，恐怕問題也正在於這個地理區域還沒有找到可以構成內部有機聯繫的媒介。至少，當我們使用「東北亞」而不是「中日韓」來討論問題的時候，無論這個視角是否能夠成立，我們都必須建立一個跨越國別界限的更複雜的觀察維度，這就是東北亞的「戰後」。

東北亞的「戰後」起始於1945年日本戰敗，而戰後的標誌性事件是東京審判。在某種意義上，東京審判確定了戰後東北亞地區國際關係的基本走向：這是一個以美國和英國為主導的霸權結構，它以正義之名審判了日本軍國主義在太平洋戰爭中的罪行，而對於太平洋戰爭之前的日本侵略戰爭卻基本上只是進行了附帶的審判，沒有與太平洋戰爭時期日本的戰爭罪行進行同等對待。在東京審判之後，美國對日本的佔領為其後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奠定了軍事和物質的基礎，由此開始了美國對東亞暴力性的「內在化」進程。但是，這個進程並非是單向的，它同時也被東北亞各個地區所反向利用。比如，美國在日本充當了「軍事代理」，使得日本在50年代迅速發展了經濟，並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時候大發軍火財；韓國也曾

利用美國駐軍為自己提供安全保障，同時得以削減軍費開支和發展經濟。對於中國來說，朝鮮戰爭使得美國從盟友變成敵人，但是在一段時期內，它仍然是牽制日本軍事力量的重要因素。在戰後的台灣，與大陸的敵對關係和無法簡單投靠前殖民國家日本的困境，也使得美國有可能乘虛而入。在東北亞地區，美國的內在化借助於東北亞國際關係的緊張而變成了一種「雙向選擇」的怪圈，就是說，由於東北亞各個國家和地區的相互敵對，美國得以內在於東北亞，變成東北亞國際事務中的一個要素；相反，由於美國的進入，東北亞地區的內在緊張又在不斷加強。冷戰結構的形成，鮮明地反映了這個怪圈的存在。

美國的「內在化」同時伴隨著另外一個現實過程，就是中國在東北亞的「外在化」。這不僅僅意味著前近代朝貢關係的破裂、原來的宗主國與朝貢國關係轉變為平等的民族國家關係，更意味著包括中國自身在內的「去中國化」傾向——這就是試圖在社會制度和文化構成上擺脫前近代中國中心的傳統，引進外在的「先進」模式。朝鮮半島和日本都在這個「去中國化」過程中試圖確立自己的獨立位置，日本還曾經試圖取代中國成為新的宗主國；中國的「去中國化」，則是一個不斷與傳統發生斷裂和重新認識自身的複雜過程。當然，中國的現代史絕不是簡單的「脫亞入歐」過程，它的「去中國化」並不意味著簡單的自我否定，而是具有非常複雜的內在矛盾和不同的價值取向。中國近代以來的反傳統傾向與回歸傳統的努力是一個相互纏繞的內在過程，此外，反傳統傾向與二十世紀後半葉的社會主義實踐之間的關係是一個尚待清理的問題，而中國內部的「去中國化」，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內涵也並不相同；但毫無疑問的是，除掉北朝鮮之外，中國在戰後與東北亞鄰國的關係變得比任何時候都疏遠。隨著中國半個世紀以來社會發展的大起大落，鄰國對於中國的理解也愈來愈難於建立。在這個相互缺少理解的狀況下，隨著後冷戰時代的開始，在東北亞開始出現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資本主義市場一體化局面，這使得美國在東北亞的內在化變得更加難以受到質疑。

於是，我們不能不思考這樣一個困境：在東北亞的地區衝突中，是否存在著可以擺脫美國霸權加以認識的「東北亞內部問題」？而被想像的中國和韓國的緊張關係，或者中國與日本的對立關係，與現實當中美國在東北亞的存在是否真的是兩個沒有瓜葛的問題？如果把美國的內在化作為思考東北亞戰後狀況的一個維度，那麼，我們到底應該如何承續這樣的一段複雜的歷史？

二

在東北亞地區衝突中，最值得思考的衝突與其說是發生在民族國家之間，不如說是發生在更複雜的區域。戰後出現的韓國和北朝鮮的關係，既是民族國家的關係，又具有著民族的和文化的內在聯結，很難與其他國際關係相提並論；中國大陸與台灣的关系，更是錯綜複雜地纏繞在一起。在後冷戰時期，資本和通俗文化的巨大衝擊力，使得東北亞以非意識形態的方式一體化了，但這種一體化改變了冷戰時期東北亞各個地區之間不相往來的局面，反倒把原來只能建立在想像基礎上的敵對和矛盾關係具體化到現實中來了，這使得對於問題的清理變得非常困難。我們不能不承認的事實是，在冷戰時期，東北亞內部的緊張關係是相對單純的，易於表述的，而在後冷戰時期，東北亞內部的緊張關係卻變得非常難以準確把握。我們已經習慣了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認識框架、民族國家的分析框架，其實都不能有效地把握當下的問題。例如，如果按照民族國家的框架來認識問題，高句麗的遺址在北朝鮮和中國東北部境內，韓國似乎並沒有代替北朝鮮直接處理這個問題的餘地；但是，韓國社會發生的強烈反應，反過來證明高句麗問題不能被僅僅作為國家間的問題處理。那麼，如何才能在邏輯上真正有效地討論這個問題呢？再比如，中國的邊疆史研究工程在韓國社會上一度引起

強烈反應，使它變成一個韓國全社會關注的問題，而在中國，這個工程僅僅被視為一個局部性的項目，並未引起知識界的關注，也沒有引發相關的爭論。即使這個問題後來被升級到國際政治層次之後，它也仍然沒有引起太多的社會關注。說中國的知識份子不敢進行批判是不準確的，準確的說法應該是，中國知識份子缺少關注這個問題的動力。這固然與這個「工程」在中國各種「工程」中位置並不重要有直接關係，但更應指出的是，中國社會的政治過程並不能想像為一個自上而下的有序過程，中國的知識生產與國家政策之間的關係也很難被設想為上下聯繫的直接性關係。換句話說，中國知識界所設計的各種「工程」和進行的各種批判，並不一定可以直接轉化為現實的政治決策，而現實政治決策所需要的「御用學術」，其實在學術界和思想界基本上不具備生命力。中國的知識生產所具有的可能性，並不能以它是否直接介入現實政治來加以衡量，包括那些敏感話題在內的學術討論，只有在具備了與現實政治並不對等的「文化政治」內涵的時候，才會引起學界的真正關注。這也就意味著，高句麗研究在中國知識界受到冷落，其實暗示著它並不具備足夠的文化政治品格。進而，作為一個政治學的課題，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是，中國社會的政治結構究竟是甚麼樣的？它的運作規律究竟應該怎樣認識？簡單地把中國知識界的一些爭論直接看作政治過程的一個環節，是否符合中國社會的真實狀況？進而還有一個問題是，批判知識份子的批判，究竟如何才能避免與現實脫節？

遺憾的是，由於過度依賴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政治分析模式，我們至今還無法有效地回答上述問題。在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的認識框架不能完全涵蓋東北亞國際關係的情況下，在認識論上如何推進對於中國政治結構的分析，如何展開對於東北亞區域政治的論述，還是一個尚未得到充分討論的嶄新課題。

在資本的力量衝擊東北亞社會的時候，政治霸權未必以政治的方式呈現。在相當多的場合，擴張和霸權的問題反倒可能以最和平的方式呈現。反霸權的有效鬥爭，也因此不能靠表態式的意識形態方式完成。在這樣的情況下，對於現實狀況的準確判斷比任何事情都重要，而冷戰時期單純的價值判斷在今天已經愈來愈失去有效性。無論是韓國、日本還是中國的知識份子，在今天都無法迴避的一個問題是，如果不把現實歸結到幾個既定的框架裏面去，那麼，我們就不能不冒赤手空拳地與現實相遇的風險——這個風險就意味著，我們有時候需要犧牲「政治正確」的安全感。

三

在東北亞和平的問題上，還存在著另外一個複雜的維度，這就是感情記憶的維度。已經有大量的文化研究證實，無論哪個國家哪個民族的感情記憶，其實都是被輿論或者其他的社會力量乃至官方意識形態打造出來的，而純粹屬於個人的感情記憶，在不加以轉換的情況下幾乎不具有社會價值。區分感情記憶中的社會性格或者意識形態性質，由此變成了文化研究的課題。

但是有一個同等重要的問題也需要得到強調，那就是衡量感情記憶的尺度不在於它是否以客觀事實的「真實性」為依據，也不能僅僅在於它是如何被生產出來的，同時，更在於它在同時代史中佔有甚麼樣的位置，在同時代史中具有甚麼樣的政治功能。換句話說，感情記憶如何被製造和被製造的感情記憶具有甚麼樣的現實政治功能，是不能互相替代的兩個不同的問題。僅僅分析感情記憶如何被意識形態打造的問題，並不能有效地逼近感情記憶最具政治性和社會性功能的核心部分。

在東北亞地區，一度最受關注的感情記憶問題，是中國與韓國對於日本侵略和殖民時代的社會記憶。在中國和日本社會之間，至今仍然沒能為這種感情記憶的現實功能找到清楚的定位，而在中國和韓國社會之間，也沒有彼此共有過這種感情記憶。可以說，在整個東北亞地區，還沒有對感情記憶進行有效的清理和轉化，也因此沒有能夠就它的「同時代史真實性」達成共識。所謂「同時代史真實性」，不是指這種感情記憶是否具有可以客觀實證的內涵，而是指它所具有的歷史和社會功能是否具有現實的真實性。因為感情記憶會轉化為一些具體的社會事件，可以間接地驅動一系列的社會效應。恰恰這一類的社會效應，是最為善變和最缺少固定輪廓的，因此人們甚至很難意識到感情記憶本身的存在。在東北亞地區不同言語共同體內部，我們可以發現很多知識份子的批判性思考背後隱藏的基本動力正是這種感情記憶，而社會保守勢力的政治立場，也與特定的感情記憶分不開。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當這種社會效應超越了國界的時候，我們很難用一國之內的價值標準去判斷它。而由於各自的感情記憶無法統一，也導致了東北亞地區很難產生「共同的邏輯」。因此，感情記憶的公共使用問題，是一個極其複雜的政治學與思想史課題。必須承認，這個課題還沒有充分得到知識份子的注意。人們往往把感情記憶如何被製造的問題作為關注的重點，而忽視了當感情記憶轉化為某種社會氛圍的時候，它所具有的同時代史功能本身。

韓國社會在高句麗問題上出現的爭執，恐怕也和感情記憶有關。正因為如此，把韓國社會出現的關於高句麗敘事中的感情要素提煉出來是一件重要的工作，更重要的工作則在於分析這些感情要素在現實社會生活中是如何起作用的。如果比較一下中國社會氛圍中對於韓國和日本的基本感情要素，可以明顯看出的是，中國市民對於韓國的好感度遠遠勝過對日本的好感度。一個具體的例證是：在中國的一些市民中間，「反日」變成了一個話題，而完全沒有「反韓」這樣的語彙。不僅如此，很多中國人會在比較中國人與韓國人在反日姿態的徹底性方面，對韓國人激烈的反日態度表示讚賞和欽佩。

但是，中國市民對於韓國的好感並不是建立在對韓國的深入了解基礎上的，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以對日本的創傷記憶為對稱軸的。近幾年出現的反日情緒，已經暴露了中國社會作為一個政治社會的不成熟，因為政治的國民應該考慮每一個社會行動的後果並且有能力對此承擔責任，而不是不計後果地發泄情緒。在這種情況下，情緒性的對抗只會把問題推向極端，而不會有助於問題的轉化。在政治性格不成熟的中國社會，建立對於日本和韓國的政治性理解將是一個困難的課題，儘管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的一些公民正在艱難地推進政治過程中的某些社會互動環節，但這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別困難而且微妙的問題是，中國市民無意識流露出來的「大國情緒」，在很多場合下並不一定具有向外擴張的內涵，作為知識份子，是把這樣的情緒推向中國中心主義的極端，還是轉化為平等前提下的對於東北亞的責任意識，是分寸感極強的思想課題。而完成這個思想課題，迫切需要中國和韓國、日本的知識份子進行合作。在此，需要有細緻的分析和判斷能力，草率從事將會帶來負面的效果。高句麗問題出現之後，最讓我們擔憂的是，這樣的齟齬是否會帶來兩國市民之間感情上的裂痕？日本侵華戰爭引發的中國社會的創傷記憶，經歷了幾代人都沒有能夠消解掉，儘管日本的很多友好人士為此付出極大努力，兩國民間的和解仍然沒有真正完成。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不願意看到中國和韓國社會之間出現感情上的對立，因為這種感情對立意味著那些沒有形狀的反感情緒被塑造成型。為了有效地制止戰爭的可能性，保持東北亞的和平，我們要盡自己的最大努力克服造成戰爭的精神基礎：歷史告訴我們，這種精神基礎是民間社會的感情裂痕，和對歷史的無知與意識形態狂熱。

最近，在中國社會開始悄悄地流行「換位思考」的說法。它的意思是使自己站在對方的立場

上，設身處地地用對方的方式想問題。這個說法的流行與近年來中國社會巨大的變化有關，因為社會的流動性使得中國社會內部不同部分有可能發生接觸，階層的、民族的、地區的差異等等造成各種各樣的溝通困難，而且很容易產生衝突。更重要的是，其實中國內部各個地區一直沒有建立真正的相互理解，這和中國人不了解外部世界幾乎是同類性質的問題。在這樣的狀態下，換位思考的意義就變得非常重要，儘管它尚沒有成為全社會的共識，但是它卻是使中國社會真正國際化的一個有效途徑，因為一個社會學會了在內部的「換位思考」，才能夠在面對外部世界的時候懂得如何與他者相處。中國社會和中國市民還沒有學會在世界史中思考自己的位置，這使得中國人在國際關係中思考國內事務的能力難以被培養起來；問題其實不在於是否有「大國心態」，而在於是否有意願自覺地依靠國際政治的眼光來分析大國的內部狀況。日本的侵略歷史證明，大國並不一定比小國更危險，最危險的是不能準確地對國際關係進行判斷，不能對社會的「內部事務」與「外部事務」的關係進行換位想像。這種換位，無論資本的邏輯如何強大，也不應該被回收到經濟利益驅動的範疇裏面去。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人如何建立亞洲視野，確實是一個緊迫的課題。這個課題的意義，也許不是改變現實，而是改變認識現實的方式。假如我們只是憑藉已有的慣性思維處理問題，那麼顯而易見，很多緊迫的社會問題是會被視而不見的。

就世界歷史已有的經驗來看，很難找到真正意義上的社會性「換位思考」的成功事例。或許對於人類來說，這種建議本身就帶有烏托邦性質。恐怕更為真實的想像是，人類如何在危急之中學會反省，學習找到不同於當今美國式暴力「輸出民主」的國際政治途徑。如果不找到真實有效的途徑，「和平」將永遠是一個美麗而空洞的口號。

對於和平的威脅性因素，是在和平的歲月裏被培養起來的。感情上的對立不可能以迴避問題「向前看」的方式消解掉，相反，對於問題的迴避只會助長隱藏在社會生活深處的那些破壞性的要素。因此，一個緊迫而艱難的課題是，我們如何才能正視感情上的潛在對立，建立不同社會和市民之間的理解和信任？假如推動中國社會的「換位思考」是中國知識份子的責任，那麼，韓國社會是否也有必要理解中國這個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在運作機制的社會，了解她的變化和難題呢？換位思考不僅會有助於了解對方，也有助於了解自身，否則，對於自我的想像也將和對於他者的想像一樣，僅僅是一廂情願的。

這些困難的課題非常難以處理，因為它有時意味著自我否定。但是，為了東北亞的和平，為了不再人為地製造感情對立，我們沒有其他的選擇。日本的進步知識份子在總結他們的近代歷史時，痛心疾首於日本一次次錯過了與東亞鄰國建立信任的機會，或許對於中國和韓國社會而言，現在也是一個建立深入了解的機會。儘管我並不認為我們可以左右現實，但是我仍然願意對中國和韓國的朋友們提議，不要錯過這個機會，讓我們盡力吧。

孫 歌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主要著作有《主體彌散的空間——亞洲論述之兩難》、《竹內好的悖論》。